

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

張錫祿

大理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本文從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大理古代「華嚴經」的抄本或印刷品，從依據「華嚴經」製作的石窟造像，佛寺木刻、紙本畫卷等「華嚴三聖」的作品；從誦持、弘揚「華嚴經」的雲南大理僧人等三個方面論證，華嚴宗從唐宋時期至今在雲南大理有一定的影響。

關鍵字：華嚴宗、雲南大理、華嚴經、雪庭普瑞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Hua-yen School in Dali Yunnan

Xi-Lu Zhang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Hua-yen School in Dali Yunn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idences of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Hua-yen School has been keeping influence of a certain degree in the region of Dali Yunnan since the Tang-and-Song Dynasties. The evidences include: the handwritten copies and the printed matter of the ancient Dali *Avatamsaka Sutra* discovered from the archeological findings; the grotto statues, the temple woodcuts and the paper scroll paintings known as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Three Hua-yen Saints, which were created based on the *Avatamsaka Sutra*; the local monks of Dali Yunnan who devote to preaching and broadcasting the *Avatamsaka Sutra*.

Keywords: Hua-yen School, Dali Yunnan, The Hua-yen Sutra, Xueting Purui

據我們研究，佛教在唐初，即武則天時期已經傳入雲南¹，後來唐中晚期陸續從漢地、西域、藏地、印度四個方向由漢僧、胡僧、蕃僧、梵僧向今雲南大理地區傳播²。傳入的是大眾部即大乘佛教，大乘在唐代業已形成了八個不同的宗派。對所傳入並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密宗」，我們已經作了一定的調查研究，出版過「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的著作。³而對於已經傳入，並有一定影響的其他宗派研究不多。根據我們所知的史料，八大宗派之一的華嚴宗，在唐宋南詔大理國時期也與密宗同時傳入雲南。並有一定的影響。華嚴，作為一個重要的宗派，在元代，得到更大發展，出現被譽為「華嚴宗主」的雲南高僧大德——雪庭普瑞曾著有疏釋澄觀《華嚴玄談》一書的〈華嚴懸談會玄記〉等⁴，名噪一時，為在海內外傳播華嚴宗有較大貢獻。在昆明及大理也有他的很多高徒。明清以來，白族密宗僧人在做科儀時，華嚴是其中的一個科。在我們發現的一些元明兩代碑刻上，有一些夾「華嚴」佛號的白族人名。

下面依時間為順序，從經典、圖像、僧眾三個方面作初步的探索。

一、雲南大理發現的古代華嚴宗經典

佛教傳入雲南大理白族地區已有一千年可考的歷史，從唐代南詔中晚期至今在佛教的傳播和影響下，曾遺留下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物，

¹ 現存昆明安寧的「王仁求碑」立於唐武則天聖曆元年（698），碑額上刻有佛龕，證明在立碑的時候，佛教已經傳入雲南，為河東州（時東洱河蠻）名家大姓王姓所尊奉。

² 見《南詔圖傳》文字卷。舜化貞中興二年（898）敕文說「大封民國聖教興行，其來有上，或從胡、梵而至，或於蕃、漢而來」。指出，傳入南詔的佛教的四條路線：胡即西域，梵即印度，蕃即西藏，漢即漢地即長安、四川等地。

³ 張錫祿：《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⁴ 〔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卅續藏經》冊12，第205號。〔元〕普瑞補注：《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卅續藏經》冊128，第1452號。

經卷是其中之一。關於佛經曾有過幾次重要的發現，⁵ 現分述於下：

（一）鳳儀北湯天村的重要發現

在幾次發現中，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的發現數量最多，保存尤為完好。

1956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到大理白族自治州進行歷史文物調查，費孝通、李家瑞等先生在今大理市鳳儀北湯天白族董氏「法藏寺」大殿中發現兩大櫥古代佛經。這是本地區文物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對佛經來說是近五十多年來第一次重大發現。

據參加整理者周泳先和楊延福二先生報告這批經卷完整的和基本完整還有3000多卷（冊）。關於分類周氏的報告有所不同。周氏說：全部經卷的內容可分下列五類：

1. 南詔晚期和大理國時代的寫本經卷共20餘卷冊。
2. 明初傳抄南詔大理國時期阿吒力教經卷，約10冊。
3. 元代和明初雲南白族人民刊刻的佛經，共280餘冊。
4. 元代先後流傳到雲南來的藏經，有南宋初年湖州刻本的思溪園覺藏，宋末元初平江刻本的磧砂藏，和元代初年杭州刻本的晉甯藏，三種共約2460餘冊，中間最多的是晉甯藏，約2200餘冊，最少是思溪藏，僅30余冊，其餘是磧砂藏。
5. 宋、元間刻印的其他經卷，明代初年刊刻的南藏和明清兩代雲

⁵ 邱宣充：《雲南民族文物調查》，〈大理三塔塔藏寫經〉（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理州文管所下關市文化館：《雲南文物》第14期，〈下關市佛圖塔的實測和清理〉、李朝真、張錫祿：《大理古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南白族人民寫刻的各種佛經約130餘冊⁶。

還有，元末明初大理地區白族刊印的佛經這類經冊，約有280多冊。其中以「華嚴經」為最多，有20多冊上蓋有朱印章，文為「董藥師賢男華嚴寶為法界造」，有七冊的末尾墨書寫「時宣光上章 灘之歲除月望日 趙州唐珍董賢記」的題記。

關於北湯天村發現的這批經卷我們作如下研究：

首先要問，這些經卷怎樣來的？

那麼我們來看看立於北湯天村法藏寺內的碑刻是怎樣說的：「今之法藏，乃趙州知州段信苴祥、請平老比丘並楊善等，前來錢塘印造三乘大藏之經文，置於本州大華藏寺。至大明聖世洪武壬戌（1382）春，天兵入境，經藏毀之。餘等儉歲之中，救得二千許卷，安於石洞。數年之間，切念斯之聖教，唯啟豐珠，未窺全寶。予等前法滇池，於太慈，圓通二寺之中，請得五千餘卷，掇來本郡，合為一藏。洪武二十五年（1392），命工起茲藏殿，以經置之。」這是董賢在永樂十九年（1421）撰的「南山大法藏寺碑」（年）的一段話，道出了經藏的來歷：一是元代趙州知州段信苴祥等所置；二是明初遭到空前的浩劫後重置的。他痛心地說：「洪武壬戌（1382）春，天兵入境，經藏毀之。」是大明王朝的「天兵」即藍玉、傅友德、沐英的鎮滇官兵來雲南後毀了經藏。以董賢為首的密僧在「儉歲之中，救得二千許卷，安於石洞。」這救出的2000多卷都是明洪武以前即元代段氏等藏於大理法藏寺的經卷。查段信苴祥為元代雲南第六代總管段義之弟。段義在至順三年（1332）任職。其中一定有南詔大理國時期的經卷。另又從其地方請回5000餘卷，共8000餘卷。這樣構成了北湯天法藏寺

⁶ 周泳先：《大理白族自治州歷史文物調查資料》（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鳳儀縣北湯天南詔大理國以來古本經卷整理記〉、邱宣充：《雲南民族文物調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理三塔塔藏寫經〉、大理州文管所下關市文化館：〈下關市佛圖塔的實測和清理〉，《雲南文物》第14期，李朝真、張錫祿：《大理古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的藏經。而至1956年殘餘3000餘卷，那麼在過了535年後，經卷損失了5000餘卷。

（二）大理三塔出土的《華嚴經》等

1978年至1981年，國家對著名的大理崇聖寺三塔進行了維修，發現了大批佛教文物，據參加工作的姜懷英、邱宣充兩位先生編著「大理崇聖寺三塔」一書介紹：⁷三塔清理出土的經卷中，除「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密宗主要典籍之外，許多方面還與華嚴宗有關。其一，這次塔基座內清理出土的殘破單頁寫經中，發現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字樣的朱書寫經，這是華嚴宗的主要典籍；其二，據王昶「金石萃編」，在原千尋塔簷下發現有「法界通靈，明道乘塔」八字，大理著名佛教畫作「張勝溫圖卷」又被稱之謂「法界源流圖」。所謂「法界有情」、「法界圓融」、「法界無疑」等正是華嚴宗的主要學說；其三，塔頂銅函內藏「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為彌陀山與法藏所譯，而法藏則是唐代著名高僧武則天時敕封為賢首大師，為華嚴三祖之一。這說明大理弘傳的密宗，顯然與華嚴宗有關。

法藏曾參與于闐之實叉難陀所主持的重新翻譯「華嚴經」的工作，實叉難陀原來亦屬大乘瑜伽教派，因不滿瑜伽派的某些觀點而創新說，他以華嚴教理，建立密宗，是唐代密宗的另一派系。而法藏亦與實叉難陀觀點相同，呂澂「佛教研究法·中國教史概略」概括說：

（李唐）一代二百九十年間……有卓然立異，引起極大之影響者，則賢首法藏其人也，賢首所見頗不滿慈恩之瑜伽、唯識，輒以抑相揚性之態度，主張法界無礙緣起之說，以其就圓融之說，頗與我國好概括之民性相洽，不久而所說大昌。

⁷ 姜懷英、邱宣充編著：《大理崇聖寺三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21-124。

這一源於瑜伽而有所創新的華嚴宗學說，後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從雲南的佛教來看，「大方廣佛華嚴經」一直是影響極廣的典籍之一，華嚴宗傳入雲南的路線，則可能是由長安經四川而入滇。……由此可見，大理佛教在南詔開始至大理國時，雖盛行大乘密宗瑜伽派系，但從教史，教義及教派看是融合了唐代以來所有盛傳的幾大派系。無論是密宗胎藏部，華嚴宗與禪宗，在這裡並無嚴格的界限，而是相互摻雜交融在一起，並與白族的祖先崇拜（本主）相結合。這可能與佛教傳入雲南有著多種不同的管道有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雲南與印度、四川、西藏以及其他中原各地經濟文化交往的歷史，也是邊疆民族地區佛教傳佈的一個顯著特點。

他們的說法有理有據，我們表示贊同。

（三）佛圖塔（蛇骨塔）出土華嚴宗經典

大理市下關佛圖塔俗稱「蛇骨塔」是南詔國時期的古塔之一。是雲南省級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0年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批准，於1981年5月8日開始，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維修，在維修過程中清理出一批佛教文物，據報告：1981年7月22、23兩日在在拆除塔門過梁時，分別在兩端出土了兩批經卷。因歷時久遠，風雨浸蝕，蟲吃鼠咬，致使經卷破壞十分嚴重。在清理中發現，經卷是用棕葉繩捆紮後用泥封裝的。由於蟲鼠的破壞，有部分泥皮脫落，繩已斷，散亂無章，現已初步整理經卷有40多卷。種類十二種，其中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圖一）、《大通方廣經》（圖二）等。裝訂形式分卷軸裝、經折裝和蝴蝶裝三種。譯經者有我國早期的經譯家鳩摩羅什，唐代的實叉難陀。寫經人和印刷者大理白族僧人楊惠、李惠、高藥師壽，智光、楊勝、趙莊等。大部分經卷為元代文物，可能有少部分大理國時期的文物。



圖一：大理佛圖塔出土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殘卷（經過修復）。採
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1。



圖二：大理佛圖塔出土的《大通方廣經》殘卷(經過修復)。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1。

（四）大理出土的古代華嚴經典目錄

最近〈大理叢書·大藏經篇〉⁸把部份大理出土的古代華嚴經典與其他經典一道影印出版。現我們把其相關目錄報告如下，可引起大家注意，進一步進行研究：

1. 第四冊：

四十四：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七（刻本），一卷，實叉難陀譯本，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八。卷首刻有「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圖」

⁸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圖三），外周為梵文環繞，內周為法器圖案。中為釋迦牟尼像，圖高25公分，寬55公分。

卷末題記為「大明國雲南大理府太和縣城北廂籍寓南門充居奉佛造經信士楊世榮……洎家眷等伏惟七處九會，廣宣天上人間」，「天順三年（1459）歲次己卯夏五月吉日謹志，密僧李禎印記」（圖四）。經折裝，存44折，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半折文6行，行17字。

祿按，此是大理佛教密宗僧人李禎印的刻本。表明大理密僧很注意誦持華嚴經。他們是顯密雙修的。

四十五：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寫本），一卷，實叉難陀譯本，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八。首尾均有「信士趙廣敬造」朱印，後有注音三行及「章十」字樣。落款題識為「大明國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丈三裡籍寓東門上街北居住奉佛造經信士趙廣……敬造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計八十一卷」，「正德五年（1510）歲次庚午正月初九日置」（圖五），經折裝，存34折，高29.5公分，半折寬11.5公分，每半折文6行，行17字。



圖三：「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圖」。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4，頁49。

圖四：採自—楊世鈺主編：
《大理叢書·大藏經
篇》（北京市：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卷4，頁
113。



大明雲南大理府太和縣城地籍書南門外奉
佛造經信蓋廣 宣人利氏秋桂男趙能 男婦張廷廷姐 女八姐
析求孫男華嚴惠泊家普等捨財命工敬造

圖五：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
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4，頁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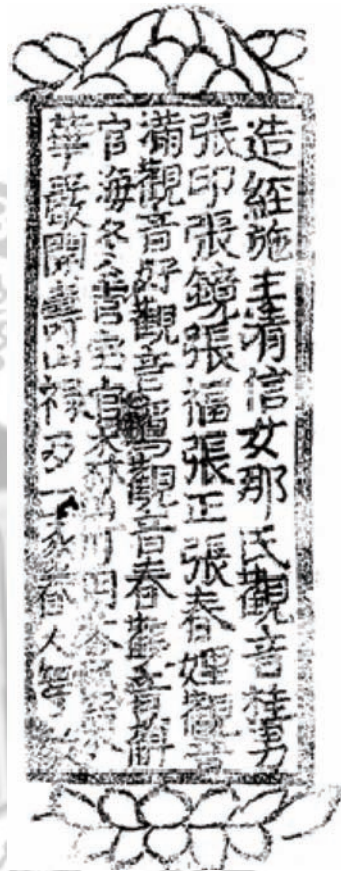
祿按：此明代大理縣居士趙廣書寫的經。說明華嚴經在廣大信眾中也很流行。用的底本是唐代實叉難陀譯本。即八十華嚴。

四十六：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四（寫本），實叉難陀譯本，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二，首尾均有殘損。有朱筆圈點，第1頁有長方朱印一枚，文為「大圓濟宮藏經」，經折裝，存36折，高34.5公分，半折寬12公分，每半折文6行，行17字。

祿按：這也是八十華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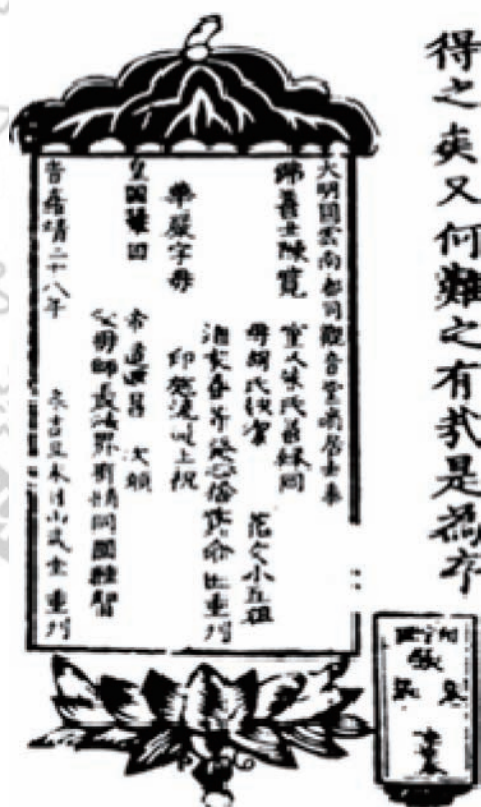
四十七：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七（刻本），一卷，實叉難陀譯本，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五。卷首刻經名木牌，牌額為雲文，兩側各刻一龍底座為蓮台。木牌上有梵文三行，下方兩側有「印施斯號為成，佛種子之因緣」十二字。卷末題記「造經施主清信女那氏觀音桂……及一家眷人等敬」（見圖六），為明刻本。經折裝，存42折，折高31公分，半折寬12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有「黎七巳」三字及頁碼序號。

祿按：那氏是大理城郊白族的姓氏。



圖六：採自—楊世鈺主編：
《大理叢書·大藏經
篇》（北京市：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卷4，頁
165。

四十八：大方廣佛華嚴經字母（刻本），一卷，內容包括「舉華嚴海會贊」、「華嚴字母起止道場大略」、「字母要解」及「大方廣佛華嚴唱字母序」。經折裝，存29折半，高29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本卷為明刻本，文中有「女小五」三字，版心中刻有卷數序號，從卷一至卷十二，每折下方均刻有法器符圖。卷尾落款為「大明國雲南都司觀音堂哨居住奉佛善士陳寬……發心舍資，命匠重刊華嚴字母，印施流通。上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次願父母師長，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吉日，水目山戒堂號重刊」（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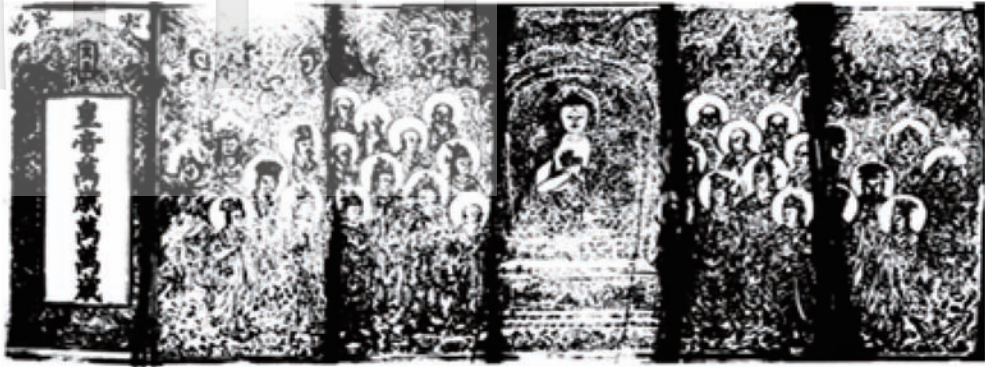
圖七：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4，頁339。

此卷應注意幾點，一為刻工，印製極為精美，為雲南雕版史中的精品，二為落款中提到「都司」的官職和「哨」的地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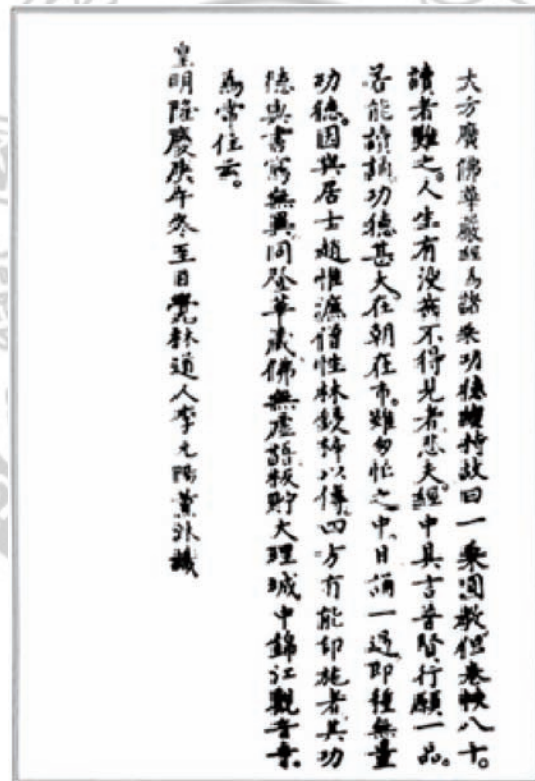
四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一）八十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刻本），一卷，此經為唐般若譯四十華嚴本。卷首刻版圖兩幅，一為釋迦牟尼佛會圖，高25公分，寬56公分；另一幅高25公分，寬10公分，四周為龍盤繞，中為一雙欄長方框，內鐫「皇帝萬歲萬萬歲」七字，框上小長方形框內鐫「萬歲」二字（圖八）。卷末有李元陽所作後記，並有年款「皇明隆慶庚午（1570）冬至日覺林道人李元陽熏沐識」（圖九）。

祿按：此釋迦牟尼佛會圖可與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釋迦牟尼佛會作比較研究。此卷為明代經卷中的珍品，有重要研究價值：經卷由明代大理地區重要歷史人物李元陽書寫，有重大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

五十：大方廣佛華嚴經經疏（寫本），殘卷。為般若譯四十華嚴經疏序言之殘卷。墨書，有朱筆斷句，無邊欄行界，首尾均殘缺。蝴蝶裝，存3至10頁，計7頁半，高29.5公分，頁寬18公分，半頁文八行，行17字。從此卷筆跡看，與明代白族書法家李元陽在許多碑刻上所寫字跡相似，疑為李元陽手跡，應為李元陽隆慶四年（1570）印製四十華嚴時同時寫成。



圖八：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4，頁343。



圖九：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4，頁399。

2. 第五冊：

六十六：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二（寫本）。全一卷，為實叉難陀譯本，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為大理國或元初寫本。卷軸裝，高30公分，長785公分，每行17字，宣紙。每29行自成一抄寫單元，每單元首行有「七帙·二」為帙碼。頁碼序號為六十二·一至六十二·十六。六十二為卷號，一至十六為抄寫頁碼，抄完後再製成長卷，由於年代久遠，有損。

祿按：此是較早的八十華嚴抄本，難得。

六十七：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三（寫本），一卷，為實叉難陀譯本，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四。首頁略有殘損，為大理國或元初寫本，卷軸裝，高30公分，卷長850公分，宣紙，每29行自成一抄寫單元，其中首頁存19行，末頁9行，每行17字，每單元首行有「七帙·三」為帙碼。頁碼序號為六十三·一至六十三·十七。六十三為卷數，一至十七為抄寫頁碼，抄完後製成長卷，本卷與上卷疑為同一抄本之先後兩卷。

祿按：這也是較早的八十華嚴抄本，難得。

六十八：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刻本），殘卷，為實叉難陀譯本，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三，首尾皆殘，僅存中間部分，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高31公分，存兩折半，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有「拱三」及頁碼序號。

祿按：這也是難得的較早的八十華嚴抄本。

六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刻本），殘卷，為實叉難陀譯本，世主妙嚴品第一之四，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僅存文30行，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存兩折半，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有「拱四」及頁碼序號。

七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刻本），殘卷，為實叉難陀譯本，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五，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首殘，僅留

後半部分，共9折半，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有「拱五」及頁碼序號。

七十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八（刻本），殘卷，為實叉難陀譯本，回向品第二十五之六，首尾殘損，為南宋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共44折，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版心中刻有「帙三」、「章六」、「章七」、「章八」等字及頁碼序號。

七十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二（刻本），一卷，為實叉難陀譯本，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之三，卷尾略有缺損，為大理國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存38折半，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有「黎二」及頁碼序號。

可注意者：卷首附圖一，為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圖右上方為「世尊在耆闍崛山，與諸大眾八部鬼神共會說法，爾時會中新發意菩薩欲從佛求長壽，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十）。卷尾刻善財童子圖，頂上經幢正中刻「功德贊」字樣（圖十一），為早期雲南版刻藝術之精品。



圖十：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5，頁605。



圖十一：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5，頁654。

七十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四（刻本），殘卷，為實叉難陀譯本，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二。卷尾略有殘損，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共29折，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有「黎四」及頁碼序號，卷首有文殊菩薩禮佛圖，卷尾有善財童子圖，此卷所用版刻繪畫與前卷相同。

七十四：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七（刻本），一卷，為實叉難陀譯本，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五，卷首殘，卷尾附有注音，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存32折，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有「黎七」、「十六末」及頁碼編號。

七十五：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五（刻本），一卷，為實叉難陀譯本，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六，卷尾略有殘損，為宋代或元初刻本，經折裝，存22折半，高31公分，半折寬11公分，每半折文六行，行17字，版心中刻「臣五」及頁碼序號。卷首有二幅版圖，一為善財童子圖，頭頂幢上刻「功德藏」三字，一為八十華嚴七處九會圖（圖十二）。



圖十二：採自—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卷5，頁740。

以上大理古代或抄寫或印刷的華嚴經典，足以證明，華嚴宗在本地盛傳。因為我們知道：華嚴宗（賢首宗）是中國唐代形成的佛教八大宗派之一。該宗以「華嚴經」為最高經典，故名。又因該宗實際創始人唐代僧人法藏武周時受封賢首國師，故又被稱為「賢首宗」。華嚴宗以杜順為初祖，智儼為二祖，法藏為三祖，澄觀為四祖，宗密為五祖。以「一真法界」為世界一切現象的本源，用法界緣起說明現象

間的關係，提出了四法界、六相圓融、十玄緣起等說，以理事關係解說教義，把「圓融無礙」作為認識的最高境界，並提出了一多、總別、相即相入等系列概念。

二、在雲南大理以華嚴宗經典為依據的造像

我們知道，南詔國在開元二年（713）或二十八年（740）遣其相張建成入唐王朝。此時漢譯的華嚴典籍已經早就流行了。不知張建成在大唐京城留下了幾年才歸，但從「玄宗厚禮之，賜浮圖像，雲南始有佛書。」這些佛經之中，是否有「華嚴經」，我們不得而知，但從現存南詔大理國石刻藝術中，毗盧遮那佛，即大日遍照佛和他的兩位脅侍——文殊和普賢組成「華嚴三聖」中我們可以看到「華嚴經」的影響。雲南古代據「華嚴經」製作的「華嚴三聖」主要有4處。

（一）劍川石鐘山石窟的大日如來與華嚴三聖造像

石鐘山石窟位於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城西南25公里沙溪鄉境內。因地處石寶山脈，又稱作石寶山石窟。關於石鐘山石窟雕鑿年代，沒有留下具體的文獻記載，從已發現的石刻題記可考證南詔天啟十一年（841）即已開鑿，至大理國盛德四年（1179）左右完成，前後延續300多年，最早開鑿年代距今已1100多年。石窟依山開鑿，綿延3公里，主要分佈在石鐘寺（8窟）、獅子關（5窟）、沙登箐（4窟）三區，共存17窟，有石窟造像和摩岩石刻造像139軀，碑碣5通，造像題記5則，其它題記40則。造像內容有三類：一是佛、菩薩、觀音、天王、明王、力士、供養人等；二是南詔王及其侍從；三為古代外國人像等。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石鐘山石窟造像以其獨特、精美及彰顯的佛教密宗的文化內涵特質，越來越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被譽為中國南方佛教密宗造像藝術的寶庫。

整個石窟群中規模最大，造像內容最豐富，雕刻藝術水準最高。除第一窟外，其它七窟連續開鑿在石鐘寺大殿后一堵高聳的紅砂石岩壁上。而在整個石窟群中開鑿面積最大的是第六窟「明王堂」。與「明王堂」毗鄰的是雕鑿有維摩詰像等的第五號窟和雕鑿有造型精美的甘露觀音第七號窟。明王堂位居大崖壁中部，面向西北。正中為一佛二菩薩式的「說法多圖」，左右兩側雕八大明王。

在明王堂牌坊式大佛龕五間內層台的佛座上，所雕造像都是背後與紅砂石大崖壁相連的半立體雕。在正中央的明間內有造像三軀，當中的佛基座為正面向前平凸的階基，上面是一個九層結構的須彌座，每層上皆雕刻有精美的圖案紋飾，須彌座上的束腰金剛蓮花寶座上面，大日如來結跏趺坐，頭上作螺螄簪，右手臂及胸袒露，左掌仰置臍前，右足盤，右手掌俯置右膝，「結破魔印」。像背後為頭光與身光組成蓮花葉瓣形的背屏，屏上雕刻著精美的圖案為飾。在主尊大日如來像左、右侍立著阿難、迦葉二弟子像（圖十三），兩像站立的基座為兩層八棱形基座，基座上又雕仰瓣寶蓮台，像跣足立於臺上。左邊阿難作光頭比丘像，頭後作圓光，身上內著金剛衫，外為袈裟。雙手合十當胸，跣足肅立。右邊的迦葉像，除面貌外、衣著、姿勢大抵與阿難相似。後龕壁面上左、右各雕一長方榜題，上、下頭雕蓮花圖案紋飾，旁雕繚繞舒卷的流雲紋，雲紋流向相對，均朝向佛光背屏頂部。右榜題上留著墨書「是無上咒，是無等咒」8個字，左榜題上也留著墨書「泛淡祥光，泛淡慈光」8個字。前一句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句子，在此意為宣揚佛的神威和崇高，後一句讚歎佛的祥瑞和慈悲。中龕的這三軀造像，古代曾妝彩，今彩繪顏色雖剝落嚴重，但在歲月造成的斑駁中仍透著昔日的莊嚴與輝煌。這三軀造像型制與宋（大理國）白族畫工張勝溫所繪「大理國梵像卷」中「南無大日遍照佛」近似，亦可證明石窟造像確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時期大理佛教密宗盛行時的遺物，造像雕鑿粗放而端嚴大氣，在莊嚴靜穆中不失內在的典雅秀美，觀之令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難得的是每尊造像

與整個明王堂大佛龕整體聯繫緊密，諧調而細部又十分變化豐富，令人讚歎不已。正中須彌座上的大日如來像，位置高於同龕的所有造像，顯示出其崇高的地位。這主尊的大日如來（大日遍照佛），正是大理佛教密宗（白密）信仰的最高神祇。也是華嚴宗的信仰的最高神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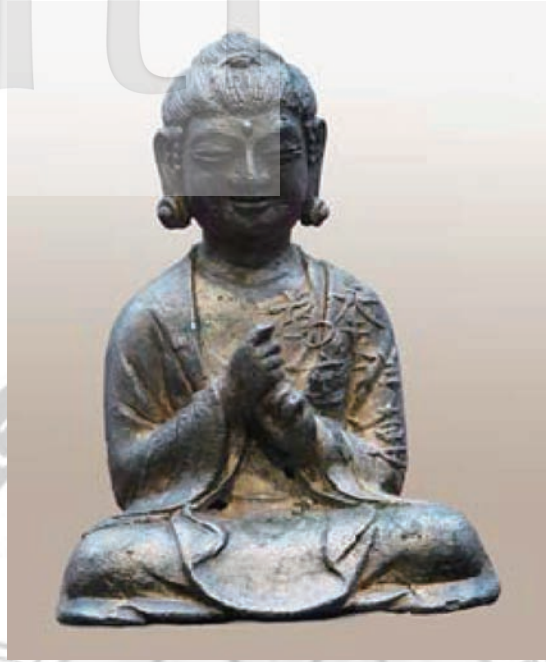


圖十三：劍川石鐘山石窟第六窟明王堂中的主尊大日如來及其二弟子。

按照佛教密宗的教義，大日遍照（大日如來）為密教供奉之重要本尊與最上根本佛，亦稱毗盧遮那佛、最高顯廣眼藏、遍照王如來、遍一切處、遍照尊。被視為釋迦牟尼佛之法身，充滿一切，光明遍照十方，系密宗將宇宙實相佛格化之根本佛，亦為一切諸佛菩薩所出之本源及所歸之果位；其身、口、意業遍虛空，演說如來之三密

門金剛一乘甚深教。「大日經疏卷」謂，大日如來分本地法身與加持受用身兩種：其中本地法身指如來之自證極位，加持受用身指說法教主；彼以平等之身、口、意三密為所入之門。故知加持受用身即是毗盧遮那遍一切身，此二身畢竟無二無別。故密宗以大日如來為最高之佛格與根本總德，以其與諸法遍在，故密號遍照金剛。又因大日如來為金，胎兩部曼陀羅之主尊，故非常被重視。其智德則以金剛界大日如來表示之，其理德則以胎藏界大日如來表示。理、智雖然二分，實際上亦不相離。佛教造像其宗教意義的實質是表法的，而在佛教密宗的修持中，修學者需皈依上師、三寶與發菩提心；在上師的灌頂加持及指導下，設壇場按嚴格的儀軌依法在修習時手結所修本尊的手印、口誦其真言（陀羅尼）、意觀本尊的形象德行；把自身的身、口、意三業，變為佛（本尊）的身、口、意三密。按次第久修後方能與法相應，感得佛的法力加持，圓滿學密行者的身、口、意、與佛（本尊）的身、口、意合一（無二）最終證果的大成就。佛教密宗的造像是佛和本尊的物化存在形象。故知深入研究佛教造像是瞭解佛教文化神秘內涵的重要課題。

1978年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塔頂出土大理國時期大日如來銀質坐像一尊，通高8.5釐米。雙耳飾璫，雙目微睜，鼻闊，厚嘴唇，眉間有白毫，右手握左手指作堅固金剛印，結跏趺坐。像身左側鑄陽文「奉為高祥造」五字，背有相同內容的陰刻文字，頭後有一人字形澆鑄。在密乘五智如來中，此佛居中央，表第九識所具法界體性智。現藏雲南省博物館（圖十四）。



圖十四：大日如來銀質坐像。

（二）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的佛會圖

大理國「張勝溫畫卷」63至67開為「南無釋迦牟尼佛會」。⁹圖左上方有榜題「奉為皇帝鵬信畫」。鵬信，是白族語，意為國王。可知此圖為奉大理國國王之命而畫的。佛祖釋迦牟尼端座在金黃色的雕有獅子的須彌座上說法。上有金色華蓋，華蓋兩旁有一小對飄逸的飛天。弟子迦葉、阿難，菩薩文殊、普賢以及觀音、童子、羅漢、天王、金剛等眾護持左右。還有白馬、白象、明珠、玉女、藏臣、兵臣、法輪等七寶。值得研究的是在普賢的前面，面向釋迦牟尼佛而盤坐的是一位南詔大理國王和立在其側的王后。他們作為供養人，也被繪入了此圖。從圖上佛、文殊、普賢菩薩三位主尊來看，這也是一

⁹ 李霖燦著：《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台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頁98-100。

幅彩繪的「華嚴三聖」，而且是南詔大理國王崇佛，禮佛的「華嚴三聖」畫圖。此畫用筆有神、著色鮮明，層次清楚，一眼望去，既佛光普照，又莊嚴肅穆。是雲南大理紙本彩繪的「華嚴三聖」精品。（圖十五）



圖十五：大理國「張勝溫畫卷」63至67開為「南無釋迦文牟尼佛會」。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三）昆明安寧曹溪寺大理國時期的木雕華嚴三聖

曹溪寺始建於宋大理國時期（937-1253年）。曹溪寺內有四十七尊佛像，唯「華嚴三聖」像彌足珍貴。它是國內現已罕見的宋代木雕造像。佛像大小和真人相似，面容慈祥。形象生動。加之雕工精湛，刀法細膩，更具文物價值。在木雕華嚴三聖像旁，還有三尊仰首而望的高大銅像，人稱「西方三聖」（圖十六）。¹⁰

¹⁰「安寧鳳城曹溪寺」，「中華佛學網」，<http://www.aaa110.com/showcontract.asp?id=4048&fid=21&sid=7>，（2013年12月16日調閱）。



圖十六：安寧曹溪寺西方三聖脫紗像，採自——「雲南佛教藝術」。

（四）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法藏寺明代木雕華嚴三聖

1956年，在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的董氏法藏寺，不僅發現了經卷。也發現了十分精美的明代木雕的華嚴三聖和四大天王造像。董氏は白族宗教世家。從始祖白族人董迦羅尤在大理國初期起一直是密宗阿吒力世家。是在家僧。父承子繼，有30餘代人在大理國、元明清都承襲密僧和僧官之職。他們家不僅存有密宗經典，還有華嚴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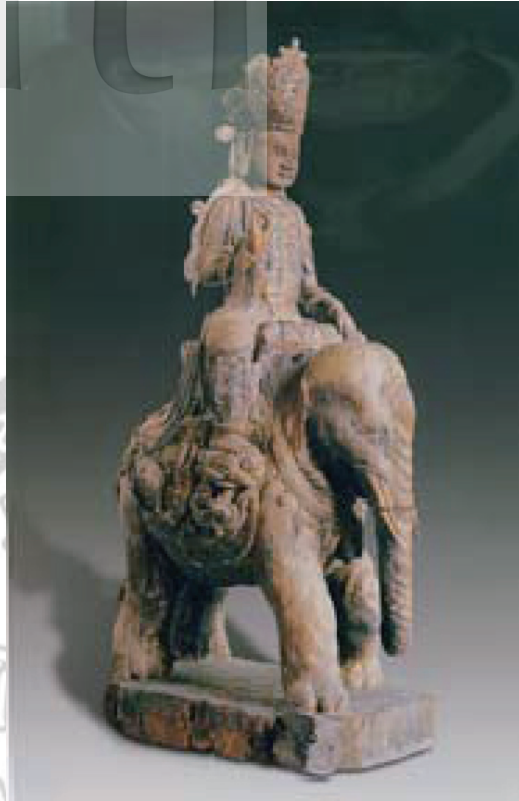
鳳儀鎮為古趙州治所。據「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記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命工起茲藏殿，以經置之。正殿中敬刊檀釋迦佛，通光座高可十三尺餘，並阿難、伽葉、四天王、金剛薩、二執金剛、萬歲牌等。左右上間，安列檀慈氏菩薩二軀，通光座高可八尺餘，左右列文殊（圖十七）、普賢（圖十八）四軀。後殿安觀音菩薩，通光座高可五尺。經閣上排五方佛、觀音、勢至□堂布三丈白金

剛、夜曼多伽、大力、忿怒、摩訶伽羅、寶藏神等五軀……」碑文中記述該寺的刊檀（木雕）佛菩薩像多達32軀，釋加佛像高達400公分以上，慈氏菩薩像高180公分。這些雕像多已毀失，現僅存6軀：其中文殊、普賢各1軀，通高均為117公分，現藏大理市博物館。¹¹ 他們與主尊釋迦佛構成華嚴三聖。



圖十七：文殊菩薩木雕像。採自——「大理市博物館藏品精粹」。

¹¹ 大理市文化局、大理市博物館編：《大理市博物館藏品精粹》（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85-86。



圖十八：普賢菩薩木雕像。採自——「大理市博物館藏品精粹」。

雲南大理的華嚴三聖的佛及佛像左的坐獅文殊與右的坐象普賢同「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圖版第104「普賢及文殊之繡像」相近，也與四川大足圓覺洞的文殊、普賢像大體一致。可見其傳入路線是沿印度、西域、長安、四川一線傳到雲南大理的。這也是華嚴經傳入的路線。

大家知道：在華嚴經中，文殊菩薩以智、普賢以行輔佐釋迦牟尼佛的法身毗盧遮那（又稱大日如來）。被稱為「華嚴三聖」。

1. 毗盧遮那佛，毗盧遮那意為遍一切處。謂佛之煩惱體淨，眾德悉備，身土相稱，遍一切能為色相所作依止，具無邊際真實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又稱法身。
2. 普賢菩薩，以其居伏道之頂，體性周遍，故稱普；斷道之後，鄰於極聖，故稱賢。

3. 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意為妙德。以其明見佛性，具足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不可思議，故稱妙德。毗盧遮那佛理智完備，居中位；文殊菩薩主智門，立於毗盧遮那佛之左；普賢菩薩主理門，位於毗盧遮那佛之右。轉之則右為智，左為理時，顯示理智之涉入胎藏界曼陀羅。

依據上述理念，雲南大理也製作了華嚴三聖的藝術品（圖十九）。



圖十九：劍川石寶山第四號窟「華嚴三聖」全圖及局部。拍攝/鮑波

三、從碑刻銘文研究元明時期華嚴宗對僧俗的影響

（一）元代雲南著名高僧「華嚴宗主」

元代，由於大理國的滅亡和雲南行省的設立，佛教界與外地的交往大大增強。雲南大理的一些高僧大德到省外尋師訪友，佛學知識更加廣博。在華嚴宗方面，出現被時人稱為「華嚴宗主」的高僧——雪

庭普瑞。年少出家，讀華嚴經開悟。曾住於水目山、再光寺。著有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楞嚴纂要十卷、華嚴心鏡、玄談輔翼等。被《中國華嚴宗通史》稱為「雲南地區弘揚華嚴教義的代表人物。」¹²

大理賓川元至正年間「故智周術妙圓鑒大師墓銘」說：

大師諱文殊勝，本姓楊氏。……泰定乙丑（1325），師年十一，投華嚴宗主雪庭和尚，受在家僧，其釋名慧超。

這裡的「華嚴宗主雪庭和尚」即雪庭普瑞。他有這樣崇高的名譽，是由於他撰寫了《華嚴懸談會玄記》的著作。這部書多次入藏。明萬曆十二年特頒入藏，題「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嘉興藏」收之，清「龍藏」收之，日本「續藏」亦收之。

關於普瑞生平，綜合多種元代碑刻可得知：

原來有僧傳說他是雲南榆城，即大理人，又有說是滇池人，即今昆明人。元至元三年（1337）立「故大理路差庫大使董逾城福墓誌銘」說「滇池比丘雪庭普瑞」，證明普瑞滇池比丘，是到大理傳教的。而不管大理也好，昆明也好，他是雲南人無疑。

原來說他「生卒年均不詳」。「道光志·金石類」曰：「圓濟蘭若碑陰，天曆二年（1329）己巳七月既望，比丘雪庭普瑞撰文。」注曰：「文見寺觀」。而寺觀志失載，訪碑亦未獲，惟知天曆二年普瑞居大理也。此時普瑞已經有名望，為寺院撰碑文了，那麼他至少是四十歲了。由此可推斷他約生於1289年左右。

述律傑撰「啟建華亭山大圓覺禪寺碑文」曰：「師未開山之前，常憩寶洞山雪庭法師之丈室……」可知他的師承關係。

關於他的成就，侯冲有過系統的考證，茲引述如下：

¹² 魏道儒著：《中國華嚴宗通史》（台北：空庭書苑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頁226。

「華嚴懸談會玄記」明確表述了普瑞的華嚴思想。

普瑞在《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開門見山地說：「將明一部「懸談」，啟以二門分別。初總解題目，後逐難釋文。初又分二：初別解法題，以經、疏、科、鈔題各別故；後通解人題，以疏、科、鈔中人無異故。」所謂一部「懸談」，即唐澄觀撰九卷本「華嚴懸談」，或作「華嚴經疏鈔玄談」、「華嚴玄談」和「清涼玄談」。上引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文字，是說他解釋澄觀的「華嚴懸談」，最開始是解釋題目，然後按順序解釋疑難問題。一開始解題目時，又分兩步，依次分別解釋經題、疏題、科題、鈔題和撰述人名。一部四十卷的《華嚴懸談會玄記》，就是按照這一順序來展開，來進行解釋的。

由於澄觀《華嚴懸談》取自澄觀撰述《華嚴經疏》、《華嚴經疏隨疏演義鈔》中有關玄談部分，所以《華嚴懸談會玄記》的「逐難釋文」，即解釋的物件和內容，既有疏文，也有鈔文，還對一些不易理解的鈔文進行科判。既沒有解釋「華嚴經」的經文本文，更沒有「本質上是借「華嚴經」傳播澄觀的華嚴思想。」因此，《華嚴懸談會玄記》，事實上只是以「鈔其略而補其缺，正其異而采其要」的方式對澄觀「華嚴懸談」進行鈔釋。

作為華嚴宗普瑞編集的重要著述，「華嚴懸談會玄記」遵循「華嚴懸談」的思路並對其中的部分內容作了更為清楚的解釋，以致於幾乎討論了元代及其前中印佛教的重要宗派和理論潮流。¹³

（二）元代大理洱海東岸白族大姓的華嚴門徒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賓川村「智周術妙圓鑒大師墓銘」¹⁴

¹³ 侯沖：〈滇僧雪庭普瑞及其「嚴懸談會玄記」〉，《雲南文史》第2期（2002年）。

¹⁴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冊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敘述洱海東岸白族大姓楊氏家族的文殊勝一支家史及其本人經歷。也記載他們與董氏的關係。楊家「祖祥充百僧之首」，是僧官。祖母「蒙時（南詔國）河東細師之嫡派董智慧之女，諱慶梁。父祥益，職阿左梨。」楊文殊勝生於延佑乙卯（1315）。過繼為董慧忠之子。「因紹其業，改姓董。」「師年十一，投華嚴宗主雪庭和尚，受在家僧，釋名慧超，善講談，通性相，清規律已。前蒙化知州段信苴賢及公子壽等，嘉其德行。元統甲戌（1334）方牧段奉訓以智周術妙圓鑒大師號之。」通過此碑我們知道：白族東洱河蠻大姓楊、董兩姓都是宗教世家，他們之間有婚姻關係。楊文殊勝被州官給予了：「智周術妙圓鑒大師」的封號。他是華嚴宗主雪庭普瑞之弟子。他以後楊董二姓的子孫在信仰密宗的同時，也信仰華嚴宗。

（三）元明誦持華嚴的白族儒釋世家

明洪武十五年（1382）無極撰文的「元故先生楊俊墓誌銘」¹⁵ 碑文敘述了該楊氏從南詔時期起有11代「博雅經論，深達性相，國君士庶，咸崇尚之」。在大理國有18代人，「扣三教之淵源，子子孫孫聰慧，理朝（大理國）亦矜式之。」在元代有3代人「窮究儒書，善鐘王字。」第五代即俊，他「幼好學，及長，宗族鄉黨以孝弟稱。既得顏卿之筆法，又攻朱子之四書。行佛之行，凡華嚴，般若等經，旦夕課誦不已。國主段惟賢賜之以長老之職」。說明，楊氏是儒釋之家，在元代，「行佛之行，凡「華嚴」，「般若」等經，旦夕課誦不已。」可見「華嚴」一經在白族之中的影響。

¹⁵ 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雲南：雲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四）明代造華嚴經典的居士家庭

明景泰元年（1450）楊森撰「杜善人壽藏同配趙氏墓誌銘」，¹⁶碑文記述杜保乃「九隆族之裔，先世居何矣城。迄高祖諱慶，仕元主簿，宗支芳衍，移牧本邑。」曾祖、祖父為居士，曾「重建承宗寺宇，三世佛相，修聖源寺走廊，造華嚴經。」杜保本人亦「辟為吏曹書史。滿考告歸田園，敬佛飯僧，課念雜華，普賢行願。」配趙氏樂師錦「勤於內助，產業富盛，夫德益修，人皆知趙氏有以相之也。」故「同穴而築壽藏」。可見白族杜氏雖為居士之家「造華嚴經」，「課念雜華，普賢行願」。

（五）夾華嚴佛號名的習俗

明天順七年（1463）祥雲縣「水日寺碑銘」¹⁷為楊華嚴壽撰文並書丹。因為深受佛教的影響，白族人在姓名制度中，有一種在姓與名中間夾佛號的習俗。又因為受到華嚴宗的影響，在元明時期白族人的姓與名中間也有夾「華嚴」或「普賢」的。

此楊華嚴壽，姓楊，名壽，華嚴是他的佛號。可見明代華嚴之影響一斑。

明弘治十四年（1501）大理挖色大成村董文信撰文並書丹「處士王公諱得春墓銘」¹⁸碑文記述王得春家世：「公配王禧之女，名曰華嚴滿。」海東地區白族王家之女王滿佛號也為華嚴。

（六）明代手書華嚴經報母恩的事例

明崇禎七年（1634）姜思睿撰〈雞足山水月庵僧書佑為母王氏書

¹⁶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冊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¹⁷ 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¹⁸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冊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寫華嚴經序》¹⁹述：「雞山僧書佑，念母恩難報，手書華嚴大藏八萬六千七百六十四言，欲持此證信如來。」碑文即「明滇直指大隱居士姜思睿」為其手書華嚴經所寫的序文。

從以上碑刻說明：元明以來，雲南大理有高僧輩出，成為「華嚴宗主」，並後有傳承者。大理白族人家以華嚴為姓名之間的佛號、造華嚴經、抄華嚴經等，說明華嚴這部大經在白族之中的傳播和影響。

四、結語

本文從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大理古代「華嚴經」的抄本或印刷品，從依據「華嚴經」製作的石窟造像，佛寺木刻、紙本畫卷等「華嚴三聖」的作品；從碑刻銘文研究元明時期華嚴宗對僧俗的影響，證明華嚴宗從唐宋時期至元明在雲南大理白族地區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其影響一直至今。

此課題本文只作了初步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2012年5月18日

於雲南大理學院宿舍403號「種書第」

¹⁹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冊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